



编辑故事

中南出版和凤凰出版的共同基因

5月请了三周长假,寄情于山水、带娃于庭院。没有应酬,没有接待,没有会议,没有文件,读书的时间倒是大大增加了,访友的机动性也随之而生。旧友新事,世易时移,感慨良多。其中之一是深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即使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也全都被手机所困。

今年,我曾邀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几位优秀出版人为《文艺报》写稿,他们不敢推辞,完成率极高,交稿极快,而受邀的省外名编有的来稿缓慢,有的突然来稿。省外来稿我总是安排及时先发,因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内部作者稿件难免积压。基于4月、5月都是省外来稿,我想取巧地将已收数月的凤凰集团编辑同行的稿件在6月集中刊发两篇——既因为休假在外没有时间,也想对得起早就来稿的凤凰同仁。

但偷懒未遂。责任编辑坚定地要求每期作者不能都是凤凰集团的编辑。

我只能“催债”。这两位作者都是我曾经约稿的人,让他们感觉自己已是“债主”,“还债”的概率才高。我不能要求从未联系过的人突然为我“救火”。

丁双平总经理是出版湘军的领头人,曾执掌岳麓出版社和中南传媒多年,能力卓越、见解出色,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很多人感情深厚,出版人的专业、豪情和言语真诚,在他身上十分突出,加上湖南人特有的洒脱,自然吸引了我。双平兄与我有无数共同语言,在一起相谈甚欢。他一日内为我完成的文稿,让我了解了出版湘军的历史一角。湖南出版之所以现在仍然辉煌,在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敢为人先的出版基因,这些基因是钟叔河、杨坚这些老将代代相传的。凤凰、中南的出版基因都很好,现在仍能传承,实在难能可贵。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总编辑陈卫春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培养的优秀教材编辑。其出版的超大份额在教育出版,而教育出版人的甘苦鲜为人知。不仅仅是出版圈外人,甚至很多出版圈内人都对教育出版知之甚少,不愿做教育出版。不是因为教育出版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从事教育出版的编辑收入不高,而是教育出版的编辑工作有些单调、乏味、艰难,要从中获得乐趣很难,但卫春似乎体会到了这种乐趣,尽管这种乐趣常由痛苦带来,并常与痛苦相伴。约稿后,我就寄予希望,收稿后则满心欢喜。

另外,就我观察,从本版两篇文章作者的性格看,双平和卫春身上都分别传承了中南和凤凰出版的基因——爽直不弯。

——主持人 徐海

教材编辑的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我看来,一名优秀的教材编辑需要了解教育、精通学科,并且需要具有项目经理人的特质。我至今很难说是一名优秀的教材编辑,只能基于在教材编辑工作中迈过的沟沟坎坎,以及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点滴反思,让更多人了解背后的故事,并通过正确选择避开阻碍专业发展的一些障碍。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材编辑,至少需要经历如下四个方面的淬炼。

好的教材编辑是“想”出来的

这里的“想”,是我对思考和规划的通俗说法。我2004年来到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一直从事教材编辑工作,至今已21年。如果让我重走过去的历程,我会选择早做规划,尤其在读研究生时就为走上编辑岗位做好专业准备。我出生于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农村家庭,小时候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学习是唯一出路”。高考结束后,我报考了师范专业。为了考研,我在本科期间深入学习了物理教学法、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类课程。2001年至2004年,有幸跟随刘炳昇先生攻读教育技术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恰逢我国启动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刘先生带领我参加各类科学教育研修班,并且参与华师版初中科学教材配套光盘的开发,创建“苏科物理网”。这些学习经历使我对教材编写有了初步了解,对物理课程形成了基本认知,拓宽了学科视野,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尤其重要的是,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形成了“要做事,先做人”的端正学术态度。

完成南京师范大学的学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我通过招聘进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从入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经常思考:“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也许在校园中的所学给我带来了一些灵感,也许是长期做网站站长,跟许多有教育理想、又有一线经验的网管员“泡”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原因,我总是能生发出许多思考。比如,做好教材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何构建高端学术引领下的立体化的教材体系?要提升教辅质量,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有新想法,我就写下来,有一些随笔整理之后就公开发表了,不适合发表的,至今还躺在我的个人电脑里。这些思考有了结果后,我一步步将它们付诸实践,请主编对教材编写思想和教学建议进行深度总结,撰写了《继承与创新——初中物理新课程



陈卫春

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继承与创新——物理实验教学功能深层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等理论专著;请教材主编牵头组建苏科版物理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申报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重大项目和教材建设专项课题,并且按照教材编写需要创建了若干子课题,为积累教材编写资源做足准备;在“苏科物理网”开通网上商城,并很快实现销售;组建“全国物理中考试题汇编”工作组,一大批一线教师自发参与对中考试题的分类整理和评价分析,试题汇编成果连续多年在“苏科物理网”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为我们的教辅编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这一系列工作,不仅把教材编写建立在深度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且将教材编者与一线教师联系在一起,有力推动了教材编写理念的深入落实。同时,我在研究过程中写下一系列论文,不仅总结了我对教育教学的思考和认识,更促使我对教育出版有了更深的感悟。总结这一段工作经历,我脑海中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要做一个好的教材编辑,需要勤于思考,善于为自己的成长不断寻找目标。”2021年9月,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八年级上下册)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获全国优秀教材(基础教育类)一等奖。这是对编写团队和我阶段性工作的鼓励,更是对我们在新起点上再出发的鞭策。

好的教材编辑是“磨”出来的

与一般图书编辑不同的是,教材编辑需要与

杨坚:岳麓书社的拓荒者

□丁双平

从绍兴古城走出的出版人

杨坚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他的人生之路犹如古城的青石板路,看似经过风雨剥蚀却愈加铿然。《人间词话》和《东周列国志》是他中学时痴迷的对象。他时常控制不住自己的阅读欲望,在课堂上偷读这些经典。只要稍有时间,他就会如饥似渴地读书。无论是人声嘈杂时,还是夜深人静处,都有他潜心读书的身影。书和他,似乎从小就结缘了。

1949年,杨坚先生进入华北大学学习,与诸多志同道合者相聚于此。除课堂学习和宣传革命思想外,他将所有剩余时间都放在书籍阅读上,常常一整天都待在不算大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杨先生阅读视野开阔,兼收中外古今。他读书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带着问题读,读完能提出诸多题外之见。

1979年,杨坚先生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他接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系统整理和出版《郭嵩焘日记》。郭嵩焘先生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将,也是清廷著名的改革派,留下了大量日记手稿,共计200多万字。因为手稿系随手所书,字迹难辨且时有衍、脱、讹、倒之处,甚至还夹杂外文,整理难度非常大。杨先生凭借深厚的文言文和英文功底,逐字逐句攻克难关,历时五年完成校订出版工作。随后他又主持了《郭嵩焘奏稿》《郭嵩焘诗文集》的校订出版工作。郭嵩焘系列图书的出版,为研究晚清史及洋务运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料。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杨先生校对的清样甚至能让印刷厂的老师傅赞叹不已:“杨老师改错,比我们排的字还工整精致得多!”这份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让他赢得了湖南出版界同事的尊敬与信任。

岳麓书社的“拓荒时代”

1983年,杨先生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转岗至刚成立一年的岳麓书社工作。当时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古籍出版工作,新成立的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专家云集,开始全面规划新中国古籍出版工作。而湖南自晚明始,留存有大量兼具地方特色又有国际影响的历史文献资料,以王船山、魏源、陶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军事、学术诸方面的大家,留存下来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整理出版迫在眉睫。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车文仪同时担任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他组织湖南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博物馆、图书馆专家学者共同研讨,确定了湖南古籍整理出版六大全集及众多散集的规划,聘任杨坚先生为《王船山全集》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及全集责任编辑。船山著作涵盖文、史、子、集,文字古奥艰深,近一千万字。此前只出版过均被称为《船山遗书》的两种王船山著作全集,一种由金陵书局刻印,六十二种,两百九十八卷,此为“金陵本”;另一种为“太平洋本”,系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在“金陵本”基础上增补缺漏而成,共计七十种,三百五十八卷。

接任务之初,杨先生面临着不少困境,然而这些困难

杨先生一直坚守着出版的“初心”。他深知出版的目不只是为了赚钱,出版本身是一项文化事业,是为了对文化历史的传承与传播

并没有让他望而止步。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老馆等地设立临时办公室办公,被同事们戏称为“游击队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杨先生带领助手以十年心力广搜版本、精校文字,终于在1995年完成了《船山全书》出版。新版《船山全书》相较于“金陵本”和“太平洋本”具有以下四大特色:首先,全面收录了传世的船山著作及以往未入集的散佚文献;其次,依据可靠的旧抄本、刻本及船山手稿对前两版进行校勘,致力于恢复原著面貌;再次,广泛搜集海内外各版本船山著作,对新版内容进行反复校订以确保准确性;最后,采用现代标点规范对全书进行精确标点,并统一编排体例,大大提升了现代读者的阅读体验。

21世纪初,湖南启动重大文化工程《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工作。杨先生以80岁高龄,拖着羸弱的身躯,强忍病痛的折磨,毅然投身于《船山全书》的再一次修订重版。一直到他去世前五天,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第二版面世后,是否还有缺失和讹误之处。

除完成两项重大文化工程外,杨先生还参与了《走向世界丛书》和《湖湘文库》的选目工作,点校了《走向世界丛书》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等5种图书,翻译出版《希腊罗马神话》。杨先生终身笔耕,总计校点古籍38种,校译编辑各种图书14种,为岳麓书社奠定了湖湘文献出版根基。

古籍整理的“杨氏标准”

对于古籍出版,杨先生总结出“杨氏三则”:这是他对古籍编辑工作的深刻认识和独到体会,对后世古籍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是死磕版本。除了以“金陵本”和“太平洋本”作参考外,杨先生几乎走访了所有收藏船山遗稿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想尽一切办法复印资料回来,反复比较,找到最佳版本作为编校出版底本。他为了给《读通鉴论》一书校正异文,确认某本异文是否为底本的正确版本,费时一年翻阅了国内8个图书馆所藏的上百本旧抄本古籍。他和团队辗转杭州、上海、北京、济南、郑州等地,在浙江省档案馆找到现存的关于其书的一些残卷,到杭州图书馆发现相关手稿,最终找到重要线索,从而校正了异文,还原了底本。

二是去除“美容”。一次在审读校样《诗广传》时,杨先生发现助手为让文本显得文通字顺,删掉了文本中的一个语气词,以致丧失原文的真实性。他当即批注:“船山先生的语法错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句话,既表现了他对原文历史性的恪守,也让后来人注意在古籍校勘工作时,谨记不要矫枉过正,随意“美容”。

优秀教材编辑是怎样炼成的

□陈卫春

肩负沉重的质量责任的健康体魄,更需要有承受心性被磨炼的勇气和胸怀。也许教材编辑就是在这样无法逃避的“煎熬”中化蛹成蝶,绽放生命光彩的。

好的教材编辑是“干”出来的

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是编辑成长的必由之路。要把自己融入教材作者团队中去,参与策划、参与创作、参与服务,与教材编写团队一起成长。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和《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正式将“信息科技”课程从原先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门国家课程。这意味着,出版社根据《江苏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纲要》编写的《信息技术》教材需要根据国家课程标准进行全面修订。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与信息科技教材编辑团队一起,从聘请主编、组织团队、洽谈合作,到研制编写大纲、确定教材目录、设计编写体例和样章等,再次经历了教材出版的全过程。

当时因种种原因,编写队伍遇到了无法当面沟通,合作交流不到位等问题,形成了较大意见分歧和隔阂。另外,不少旧版教材的资深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却一直在细节问题上打转,而教材的写作逻辑、呈现形式、栏目设计等也没有形成明确共识,导致作者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陆续有核心作者要求退出编写团队。看到这一形势,我一方面想方设法走进每一位作者的内心,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然后将有不同观点的人拉到一起面对面交流。同时,跟主编反复沟通,直至对教材编写的一般程序、人员分工、教材呈现等形成一致意见。说服主编后,我随即组织召开全体编写人员会议,带领编写队伍从迷茫中走出来。

好的教材编辑是“带”出来的

好的领路人,对于教材编辑的成长至关重要。教材无小事,对教材编辑而言,编辑的工作



丁双平

三是勘注如探案。“食倭瓜三片”见于《郭嵩焘日记》。为厘清“倭瓜”的本义,杨先生不仅考证出“倭瓜”在晚清时期的湖南特指南瓜,而且还将清同治年间的长沙菜市场瓜菜价格行情表附注于后。这种勘注方式,让读者不仅知书,还能见微知著。这就是杨先生功底深厚、整理古籍有据有迹的体现。

这样高标准的要求,使有些同事叫苦不迭。据说有实习生在办公桌桌角偷偷地刻下了“杨公校书,十命九休”的谚语。却未想被杨先生看见了,他非但不恼,还笑吟吟地说:“剩得一条命,也正好用来校《全唐文》。”这份幽默和豁达,表现出杨先生对古籍整理的高标准坚守。

杨先生一直坚守着出版的“初心”。他深知出版的目不只是为了赚钱,出版本身是一项文化事业,是为了对文化历史的传承与传播。这一点在杨先生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比如坚持有疑惑处必深究,判断不清的字必查证,始终坚持用笔校打印书稿,他常说:“这可以告诉电脑,人的手能写汉字;告诉电脑,人手写字是有尊严的。”“校书如扫落叶,也许扫不干净,但需尽自己的能力,以不失落一片树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是这样说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这位在编辑工作中从不苟且的老人,待人谦和有礼,是岳麓书社的“活字典”。无论编辑书稿中有什么问题,到他那儿总是可以迎刃而解。在生活中,他也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如有一次他参加出版社年会表演节目时,用带绍兴口音的湖南普通话念自己写的打油诗:“勘校校到眼花花,错字跳出来呱呱。白日黑夜叫,逮住一个笑哈哈。”打油诗里不光体现了自己的豁达乐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亲切和诙谐。

杨先生的付出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高度认可。《船山全书》出版后,张岱年、任继愈、程千帆等十余位学者赞誉《船山全书》为“古籍整理范本”。张舜徽先生致信杨坚:“校对仔细,力求无误,认真负责之精神,实罕其匹。”

1995年,杨先生凭借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稻香出版奖,两年后,他主持编纂的《船山全书》荣获1997年度国家图书奖。

出版家钟叔河感叹道:“他坐得住,极认真,逐字细读,这种人如今已绝迹。”出版家、作家唐浩明撰文深切怀念杨坚先生,对他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岳麓书社将杨先生总结出的“塑我、塑文、塑他”(自我淬炼、雕琢文本、滋养后人)作为社训;岳麓书社纪念墙上高悬着杨先生的照片,以此来纪念这位卓越的出版家。

(作者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习惯、学科背景、对教育的理解,都会对教材质量和服务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我来到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最初任务,是组织高中物理教材编写和送审。因为读研期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过长时间的兼职,并且接受过出版业务培训,对编、印、发、财整个出版流程,以及编校规范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我的带教老师贾丽华从一开始就放手让我独自开展工作,处处鼓励。这对我来说不仅有了独立思考和接受锻炼的机会,更树立了我对做好教材编辑工作的信心。在编校能力的培养上,贾老师非常细心。她将我看过的稿件拿过去仔细加工,然后结合她对编校工作的认识逐条指出我的问题,告诉我需要关注的各个方面。在她的熏陶和悉心指导下,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编辑加工风格,做到了简洁明快、表意清晰。如果说,我对稿件加工到有一些经验积累的话,绝大多数来自贾老师的倾囊相授。

教材编辑,不仅仅要做业务,更重要的是做人。成熟的教材编辑,既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不人云亦云,更要以诚待人,为作者考虑,赢得信任。记得2011年教材修订送审时,我还是一名物理教材编辑。这一轮修订送审,物理学科基本沿用了2003年教材编写队伍的原班人马,部分编写人员已经难以胜任教材编写工作。因此,我提议发掘并培养一批新的教材编写人员,并在与主编沟通后邀请了一位教学经验丰富且文字功底强的中学特级教师参与教材编写讨论。但这一决定,遭到了不少作者的反对,并且私下提出质疑。发现这一问题后,我逐个找他们谈心,告诉他们这样做的道理,以及我在事前所做的工作。最终,时间证明了一切,这位老师不仅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在后来的教材编写和审读把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人说,做教材编辑难,做一名优秀的教材编辑更难。但其实也并非全是,因为我们只需要有把教材出版当成毕生事业的情怀,踏实做好每一件事,诚恳对待每一个人,即使遇到困难,也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作者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